

讓「文化他者」發聲： 西方文學方言翻譯研究述評

汪寶榮

文學方言是指作家用書面語再現限於一地或在某個社會階層內部使用或在這兩方面均受限的一種口語。由於非標準語言變體轉換上的不對等，以及方言蘊含的地方色彩和社會文化意義很難移植到目標語言文化中，文學方言是中外翻譯界公認的難題，也是目前研究相當缺失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基於相關研究文獻，重點對西方關於文學方言的運作機制及其可譯性和翻譯策略的研究現狀進行述評，結果顯示：一、早期西方研究者主要從語言學和方言學角度分析文學方言的運作機制，當代學者則大多採用社會語言學、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或後現代主義、後殖民翻譯理論進行考察；二、西方譯者和翻譯學者普遍認為文學方言難譯，甚至不可譯，歸根結底是譯文做不到「忠實」或「對等」；三、當下西方學界逐漸達成共識，認為方言標準化譯法和方言對譯法的效果不甚理想，文學方言自創譯法和方言特徵淡化譯法則比較可取、可行；四、有關研究顯示，文學方言翻譯策略隨歷史情境而變，說明文學方言並無絕對正確或適當的譯法；五、如果譯者放棄對「忠實」或「對等」這種不切實際的追求，採取適當的補償性翻譯策略，就能讓「文化他者」發聲，推動中西文化對話。論文最後指出未來研究路徑供國內研究者參考。

關鍵詞：文學方言、運作機制、可譯性、翻譯策略、文化他者

收件：2015年9月25日；修改：2015年11月18日；接受：2016年7月1日

汪寶榮，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Email: abrwanghz2014@outlook.com。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翻譯社會學視閥下中國現當代小說譯介模式研究」（項目編號：15BYY034）和大陸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翻譯社會學視域下中國現當代小說譯介模式及其運作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4YJA740032）的階段性成果。本文研究還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特此鳴謝。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修正意見及建議，令本文見解更趨公允。

Giving a Voice to the “Cultural Other” —A Critical Review of Western Studies on Literary Dialect Translation

Baorong Wang

As a generally recognized and somewhat vexing problem for the translator, literary dialect translation is largely under-researched.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Western studies on literary dialect and its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its mechanism, its translatability, and four strategies the translator may opt for. It is concluded that literary dialect is generally deemed untranslatable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simply because in this case the traditional goal of fidelity or equivalence is virtually unattainable. The difficulty of translating literary dialect lies more in the need to transplant its regional and socio-cultural connotations to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n in the need to find a nonstandard target-language equivalent. Of the four basic dialec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dialectal standardization and dialect-for-dialect translation are now generally held to be unsatisfactory, while creating an ad hoc literary dialect and making sparing use of target language dialectal features are thought to be more feasible and more desirabl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translator’s adoption of a translation strategy is subject to the changing historical context, suggesting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ly “correct” or “appropriat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dialect translation. Nonetheless, here it is argued that the target text can give a voice to the “cultural other”—and thereby contribute to the China-West cultural dialogue—if the translator opts for a proper compensatory strategy.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several possible avenues of further research which could improve the *status quo* in this field.

Keywords: literary dialect, working mechanism, translatability, translation strategy,
cultural other

Received: September 25, 2015; Revised: November 18, 2015; Accepted: July 1, 2016

Baorong W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mail: abrwanghz2014@outlook.com

壹、緒論

許多中外作家喜歡在小說或戲劇作品（尤其人物話語）中運用方言，但很少未經加工提煉就直接取用真實口語，無論是地域方言 (geographical or regional dialect) 還是社會方言 (sociolect)。因此，對文學作品中運用的方言（社會語言學稱之為「非標準語言變體」—— non-standard language variety）的準確表述是「文學方言」(literary dialect)。¹ 美國語言學家克拉普 (G. P. Krapp) 在 1925 年出版的專著《英語在美國》和翌年發表的論文〈方言寫作心理〉中，首次提出「文學方言」這個重要概念，認為「運用文學方言的作家對準確描寫民間口語並不關心。作為藝術家，他們總是關注文學方言的效果，因而必須根據其寫作目的對基於科學觀察的口語材料進行選擇和剔除」(Krapp, 1971, p. 24)。² 1950 年，美國方言學家艾夫斯 (S. Ives) 在影響深遠的〈文學方言理論〉一文中將「文學方言」定義為：

文學方言是指一位作家試圖用書面語再現限於一地或在某個社會階層內部使用或在這兩方面均受限的一種口語。其再現手法可能只是偶爾改換一個單詞的拼寫形式，……也可能把他觀察到的一種方言的全部語法、辭彙和語音特徵表現在作品中，以便儘量接近科學意義上的準確性。(Ives, 1971, p. 146)³

由以上定義可知，文學方言帶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和獨特的社會文化內涵，很難移植到目標語言文化中，是公認的小說、戲劇翻譯難題，因此國內外學界及翻譯界對「文學方言是否可譯」、「哪一種譯法較可取」等焦點問題長期爭論不休，至今沒有定論。由於作為非標準語言標記

¹ 由於文學方言研究在中國還不成熟，不少國內論者往往把它與「方言」混同起來。

² 本文所引全部外文文獻均由筆者譯成中文。

³ 此處引用的是略有修訂的 1971 年重版本。

的方言往往被視為「地位低下」(low-prestige) 或「帶有負面的社會符號價值」(negative socio-semiotic value) (Rosa, 2012, p. 88)，方言寫作在中西文學傳統中都屬於邊緣的「另類」，這直接導致了方言翻譯實踐量的有限。⁴ 另一方面，方言標準化譯法一直是「應用最普遍的翻譯策略」(Rosa, 2012, p. 87)，造成「標準語與方言的區別往往在翻譯中反映不出來」(Anderman, 2007, p. 57)，因此，中西翻譯理論都聚焦於用標準語寫成的文學文本，「對(文學)方言翻譯的研究很少見」(陳吉榮, 2010, 頁67)。國內學者較早關注文學方言翻譯問題，例如，茅盾在1921年就提到方言詞翻譯之難(參見陳福康, 2000, 頁238)；傅雷(1984, 頁83)在1951年指出，採用方言對譯法會「把原文的地方性抹煞」，但翻譯時如把原文的方言特徵抹去，「譯文(又會)變得生氣全無」。近十幾年來，國內的文學方言翻譯研究日趨活躍，一些學者對該論題進行了理論思考(朱達秋, 2001；郭著章, 1994；陳國華, 2007；黃忠廉, 2012；劉全福, 1998；Wu, 2009)，或基於個案研究的思辨分析(王豔紅, 2008, 2009a；李穎玉、郭繼榮、袁笠菱, 2008；韓子滿, 2002；Wu & Chang, 2008)，還出版了兩本專著(王豔紅, 2012；Han, 2004)，但總體上這方面研究尚「不多見」，且「缺乏系統性」(王豔紅, 2009b, 頁77)。筆者在研讀相關英語文獻的過程中發現，過去二十多年，西方的文學方言翻譯研究相當活躍，理論視角趨向多元化，有方言學、社會語言學、文學理論、描述翻譯學、後現代主義、後殖民理論等，很值得我們參考，但這些成果的很大一部分尚未引起國內研究者足夠關注。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圍繞文學方言的運作機制及其可譯性和常用翻譯策略這兩個核心問題進行述評，最後指出未來研究路徑供國內研究者參考。

⁴ 誠然，著名翻譯家傅東華、張穀若、董燕山等都運用過不同的策略處理西方文學作品中的文學方言，但方言翻譯實踐總量不多顯然是方言翻譯研究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貳、文學方言的運作機制及其可譯性

一、文學方言的運作機制與翻譯

文學方言的翻譯與其運作機制密切相關，因此西方學者對此進行了多角度的論述。克拉普 (Krapp, 1971, p. 24) 以美國作家哈裏斯 (J. C. Harris) 的方言小說為例指出，「語言與這些故事內容的關係是如此的緊密，就像在同一串常青藤和同一棵無花果樹下長大的雙胞胎，任何人如果試圖把它們譯成一套較簡單、較規範的用語，就會立即發現故事的大部分魅力在翻譯過程中被毀掉了」。艾夫斯 (Ives, 1971, p. 146) 指出：「說『方言』的那些作品人物，要麼在社會階層上，要麼在地域上，與說標準語的大部分人物形成對比。這種方言所暗示的差異通常帶有說方言者地位較低的涵義，但並非總是如此」。艾夫斯關注的是語言內部變異如何被用於再現社會方言或地域方言，沒有提及文學方言的翻譯問題。克拉普和艾夫斯各自從語言學和方言學角度分析文學方言的運作機制，當代西方學者則大多採用社會語言學、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或後現代主義、後殖民翻譯理論進行考察。例如，美國學者阿澤維多 (M. M. Azevedo) 指出：

文學方言將口語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⁵ 使我們注意到某些作品人物不標準的說話方式如何形成蘊含社會語言和文化意義的語言內部差異。這種差異不僅表現在作品人物之間，還表現在作品人物和讀者之間。從這個角度看，一篇成功的譯文須儘量抓住作品人物間語言差異蘊含的意義。(Azevedo, 2009, pp. 198-199)

阿澤維多 (Azevedo, 2009, pp. 193-194) 還認為，文學方言是作家對真實口語的模仿，即把口語中數量有限的顯著特徵組合起來加以運

⁵ 什克洛夫斯基 (Shklovskij, 1998, p. 19) 指出，20 世紀初，一些俄國作家（如托爾斯泰）「開始傾向於在作品中使用方言和不規範的語言形式」，這是取得他所說的「陌生化」效果的手段之一。

用，「如此一來，作品中某個人物的聲音就與其他人物或敘事人的聲音形成了反差」，也就是穆卡洛夫斯基 (J. Mukařovský) 說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⁶ 作家基於他以為讀者熟悉的語言原型 (linguistic stereotypes) 創造一種文學方言，「以便增加人物語言的逼真感或注入幽默感」(Crystal, 1995, p. 410)。阿澤維多 (Azevedo, 2009, p. 196) 指出，「透過與標準語形成反差，文學方言有效地使一個在語言和社會地位上有別於作品中的主流人物及讀者的他者發出聲音」，而要讓譯本讀者感覺到這個「文化他者」(the cultural Other) 的存在，辦法之一是借用一種現成的文學方言（即下文所稱的「文學方言自創譯法」）。

加拿大學者拉內一梅西耶 (G. Lane-Mercier) 主要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分析文學社會方言 (literary sociolect) 的運作機制：

文學社會方言一般出現在作品人物的直接引語中，其語音、句法、辭彙和語義配置通常（但並不總是）被置於負面或貶損模式中，因而與社會涵義上「中性」、語言上「正確」的敘事人或其他人物的話語形成反視。……然而，文學社會方言不能被定性為是對現實生活中使用的社會方言的真實、未經作家干預的複製。傳統上，小說家們運用非標準語言模式是為了取得喜劇性穿插 (comic relief)、栩栩如生或社會語言和文化上的寫實假像等效果，因此他們對文學方言的文體作用、主題意義和敘事功能的考慮大於對其模仿、忠實和真實程度的考慮。(Lane-Mercier, 1997, p. 46)

針對文學社會方言的翻譯，拉內一梅西耶借用美國學者韋努蒂 (L. Venuti) 的後殖民翻譯理論和法國學者貝爾曼 (A. Berman) 的翻譯倫理理論指出：

考慮到文學社會方言反映並折射文化原型、身份建構和權力關

⁶ 「一個語言單位與留在背景的另一個語言單位形成反差」，就會產生文學語言的「前景化」效果 (Mukařovský, 1970, p. 44)。

係，其翻譯方式可理解為要求譯者承擔起用「暴力」手段生成審美、意識形態及政治意義的義務；只要譯者對自己的翻譯決策和翻譯策略確立的文化他者及文化自我的關係和形象負起責任，那麼這種義務就根植於翻譯倫理，也隱含著某種譯者的顯身。……文學社會方言翻譯蘊含著雙重暴力，第一種暴力存在於作家對有社會地位標誌的語言配置的再現，另一種存在於翻譯過程中。從這個觀點看，文學社會方言的典型翻譯方式是譯者採用特定的翻譯策略對原作意義進行增刪、改變、破壞、仿擬。(Lane-Mercier, 1997, pp. 45, 48)

在拉內—梅西耶看來，不僅翻譯過程中充滿了「暴力」，而且譯者的翻譯立場也不可避免地體現於譯本之中。

二、文學方言是否可譯？

很多西方著名翻譯家認為文學方言不可譯，其中難免有為自己開脫責任之嫌，但其翻譯之難由此可見一斑。⁷ 例如，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奎斯(G. G. Márquez)的主要英譯者、美國翻譯家拉巴薩(G. Rabassa)認為：

有的書很難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就像一頭倔驢「牽不過去」一樣。鄉土文學有一種地方風味，在原文語言中一下子就能感受到。……然而，正如一種語言的辭彙在其他語言中沒有真正的對應詞一樣，方言或地方口語在其他語言中也沒有真正的對應物。全世界都有鄉下人，但是讓一個巴西牛仔像美國阿巴拉契亞山民一樣說話，顯得既荒謬又古怪。因此，將地方土話搬到另一種語言必須被列為又一種不可譯之例。(Rabassa, 1974-75, p. 33)

⁷ 「可譯性」是西方學界和翻譯界喜歡探討的一個傳統話題，與之相關的另一個老話題是「翻譯中的流失」(loss in translation)。

翻譯了魯迅小說全集的英國年輕漢學家藍詩玲 (J. Lovell) 也指出：

方言很難翻譯，……因為幾乎不可能找到一種對等的目標語方言。……處理方言時譯者有多種選擇，比如說試著把它譯成一種英語方言，例如威爾士語或倫敦土話。不過我認為那樣做是有問題的，因為你在向譯文讀者暗示這些故事人物不是中國人，而是來自倫敦、威爾士或約克郡。（參見汪寶榮，2013，頁 159-160；Wang, 2014, p. 8）

被夏志清（1996，頁 21）譽為「公認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的葛浩文 (H. Goldblatt) 也表示，「在賈平凹的作品裏面，西安方言或陝西山裏人的土話俯拾皆是，時常把我搞糊塗。對譯者來說，方言是一個難題；也許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小說翻譯面臨的普遍性難題？」（參見 Stalling, 2014, p. 8）。

持類似觀點的西方譯者還可以舉出很多，此處不贅。總之，西方譯者普遍認為文學方言不可譯、不易譯或不值得翻譯。皮姆 (Pym, 2000, p. 75) 分析了這種消極觀點背後的原因：「一般情況下，委託人不會因為譯者設法翻譯了作品中的方言而額外付錢，讀者也不知道譯本中丟失了什麼，而國際翻譯界迄今沒有就方言翻譯給出明確的指令」，「以上種種都跟譯者高尚的生存危機不相干」。換言之，當今西方主流翻譯規範對文學方言翻譯較為寬鬆，即使譯者不把文學方言譯好，也不會丟掉飯碗。

以上所述可說是西方譯者的普遍看法，那麼西方翻譯學者的觀點又如何呢？以下引用的是較有代表性的論述：

語言內部差異幾乎不可能令人滿意地翻譯出來。（House, 1973, p. 167）

對譯者來說，最糟的情形是，文學社會方言是一個界限明確的不

可譯區域；最好的情形是，方言屬於不透明的、阻抗性文本成分，翻譯過程中伴隨著過多的意義流失和增益，對此人們應該不足為怪。在方言翻譯領域裏，「忠於原文」這個概念及其可能性都作了廢，而使翻譯行為成為可能的各種條件也受到質疑。(Lane-Mercier, 1997, p. 49)

文學作品中使用的方言很難處理，儘管譯者有幾種辦法去對付這個難題，但是可以說沒有一種辦法是令人滿意的。(Sánchez, 1999, p. 308)

眾所周知，方言和社會方言這些非標準語言變體令譯者大傷腦筋。由於目標語中很可能不存在具有相同情景特徵的語言變體，方言在原文中的功能會在譯本中減弱或丟失，而用標準語翻譯用方言寫成的對話這種常用翻譯策略會導致原作及其作者的語言身份的丟失。(Leppihalme, 2000, p. 247)

把用標準語寫成的文本譯成另一種標準語相對簡單，因為兩種標準語……的指示意義和內涵意義總有一些對應，因而可譯程度較高。然而，文學方言依靠一種語言內部的特定差別運作，而這種差異在其他語言中不一定存在一對一的對應。(Azevedo, 2000, pp. 30-31)

文學方言的存在給文本增添了交際和符號價值，在翻譯語境中給譯者造成了額外的困難。……由於語言因素受到文化和社會的制約，從而給譯者帶來焦慮時刻和「文化碰撞」，使得一些論者認為方言不可譯。(Ramos Pinto, 2009, pp. 290-291)

上引文字中被聚焦的主題詞有「困難」、「不可譯」、「無對應或對等方言」等，在在指向「不可譯」這個核心命題。從這些學者的論述可知，文學方言之所以被認為難譯甚至不可譯，不只是因為語言變體轉

換上的不對等，更是因為方言蘊含的社會文化意義很難移植到目標語言文化中；即便勉強移植過去，也往往被扭曲或丟失。然而，儘管如此多的西方譯者及學者認為文學方言難譯，甚至不可譯，難以做到「忠實」或「對等」，文學方言還是在被翻譯，且不乏相對成功的案例。俄國學者布羅多維奇 (Brodovich, 1992, p. 355) 指出，含有方言成分的文本經過翻譯會遭受大量的意義流失，因此有些學者提出方言是「抗譯的」；然而，塞林格 (J. D. Salinger) 的《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奧尼爾 (E. O'Neill) 的《榆樹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蕭伯納 (G. B. Shaw) 的名劇《賣花女》(*Pygmalion*) 等作品都已被譯成俄語，且這些譯本「被廣泛閱讀，得到很多讀者的讚美」，說明「方言是『抗譯的』這種極端觀點沒有事實依據」。有鑒於此，我們大可不必糾纏於「文學方言是否可譯」這個難有定論的論題，而應重點考察「哪一種譯法較可取」這個更有意義的問題。

參、常用的四種文學方言翻譯策略

本文所稱的「翻譯策略」指「譯者在把一個文本段譯成另一種語言的過程中遇到一個難題，為解決該難題而有意識採用的一種翻譯方法」(Lörscher, 1991, p. 76)。過去二十多年，西方學者集中討論的文學方言翻譯策略主要有四種：方言標準化譯法、方言對譯法、文學方言自創譯法和方言特徵淡化譯法。其中後兩種可歸入圖裏 (Toury, 1995, pp. 273-274) 所稱的「有意識補償」(conscious compensation) 類翻譯策略。以下述評西方學者對這四種翻譯策略的研究和論述，包括理論基礎、優劣、特點和實際效果等。⁸

一、方言標準化譯法 (Dialect Normalizing/Standardizing)

這種翻譯策略是指「將原文方言特徵譯成平淡無味的標準目標

⁸ 目前國內學者主要關注方言對譯法和方言特徵淡化譯法。為便於讀者進一步研讀，本文在評述西方研究時會提及國內相關研究。

語，令譯文中沒有明顯的方言痕跡」(Hervey, Higgins & Haywood, 1995, p. 112)。其理論基礎可歸結到圖裏提出的「更大標準化法則」(law of growing standardization)，即「在翻譯過程中，存在於原文中的文本關係往往被改變，有時甚至被完全忽略，代之以從目標語形式庫 (repertoire) 中選擇更常用的語言形式」(Toury, 1995, p. 268)。⁹ 筆者認為，「存在於原文中的文本關係」應包括標準語與方言之間的語言內部差異，因此圖裏所說的「從目標語形式庫中選擇更常用的語言形式」，可理解為譯者選用目標語規範形式處理原文方言特徵，其結果是「譯文往往表現出比原文更大的標準化傾向」(Toury, 1995, p. 268)。萊皮哈爾梅 (Leppihalme, 2000, pp. 259-260) 認為，圖裏的「更大標準化法則」即指標準化翻譯策略，可用於處理隱喻、功能歧義、文字遊戲、方言等翻譯難題。

皮姆借用管理學術語「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試圖修正圖裏提出的標準化法則。他認為，「譯者傾向於將原文語言標準化或化解原文的干擾，因為這是降低或轉移交際風險的兩個主要辦法」；標準化本質上是一種「規避風險的策略」，其根源是「譯者的活動不受獎勵結構的支配，因此譯者一般不會有冒險的意向」；「如果願意冒險的譯者會被獎賞（無論經濟上的、象徵性的還是社會獎賞），那麼他們就會去冒險，而不是設法轉移風險」(Pym, 2008, pp. 325-326)。顯然，圖裏對翻譯標準化現象提出了理論假設，皮姆則從經濟學和管理學視角對其進行分析，其中不乏為譯者辯護的意味（又見 Pym, 2015）。拉莫斯·平托 (Ramos Pinto, 2012, p. 159) 指出：促使譯者採用標準化譯法的外部制約因素有審查制度 (censorship)、機構施壓、翻譯職業地位低下、對語言準確性的理念等；語料庫資料分析顯示，標準化在譯本中是一個「反復出現的現象」，因而目前「已被視為一種翻譯共性 (translation universal)」。羅薩 (Rosa, 2012, p. 93) 進一步指出：「譯者不把地位較低、非標準的文學變體在譯文中再現出來，而是將其標準化，從而造成一個單聲 (monoglossic) 譯本，是因為其翻譯決策可能受制於各種動機和制約

⁹ 本文參照張南峰（2004，頁 54）的譯法，把 repertoire 譯為「形式庫」。

因素」，包括：

- (一) 給譯者的任務書中載明的編輯指導方針。
- (二) 目標文化中有約束力的翻譯規範。
- (三) 目標讀者以及譯者對目標讀者閱讀期待的推測。
- (四) 譯者難以確定一種既與原文方言對等又能為目標讀者接受的目標語方言。
- (五) 譯者試圖避免方言對譯法可能產生的並非出於作者本意的效果。
- (六) 委託人給譯者的時間緊、酬金低、翻譯工具和資源缺乏。

以上第三點及第五點屬於譯者的「動機」，其他都是外部「制約因素」。不難看出，皮姆、拉莫斯·平托和羅薩均強調經濟因素和職業地位對譯者選擇文學方言翻譯策略的潛在影響。

儘管譯者往往由於社會經濟因素的制約而採用方言標準化譯法，這種做法本身卻頗受翻譯學者的質疑或批評。埃爾維等人 (Hervey et al, 1995, p. 112) 認為，如果方言特徵只是偶然出現在原文中，譯者可採用標準化譯法；如果小說情節或人物形象塑造依賴方言，那麼「譯者就須設法向讀者指出原文中含有方言特徵」。桑切斯 (Sánchez, 1999, p. 308; 2009, pp. 221-228) 對《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 幾種西班牙語譯文的考察發現，很多譯者用標準語翻譯方言，因為該譯法「儘管效果不盡如人意，卻是最不費力的」。阿澤維多 (Azevedo, 2009, p. 195) 考察了《唐吉訶德》(*The Ingenious Gentleman Don Quixote of La Mancha*) 第八章中比斯蓋紳士所說的蹩腳西班牙語的 12 種英譯文 (1612—2000 年間出版)，發現三位譯者採用了方言標準化譯法。¹⁰ 阿澤維多指出：對譯者來說，「最便利的辦法是全然忽略原文含有的非標準語言特徵，改用標準英語重寫」；但是，「用標準目標語翻譯原文方言簡化了譯者的工作，也使讀者的閱讀變得輕鬆，卻丟失了比斯蓋紳士這個人物形象塑造中的一個

¹⁰ 該段情節的中譯文參見楊絳譯《唐吉訶德》(上) (2011, 頁 50)。楊絳故意使用不規範的漢語語法，或顛倒中文詞序，例如「我不紳士？對上帝我發誓：你很撒謊！」，把比斯蓋人所說的蹩腳西班牙語譯得活靈活現。這種方法可算是方言特徵淡化譯法。當然，文學方言翻譯策略各有其優劣，不同的譯者會選用不同的譯法。

要素，即他說話的方式讓人覺得他是一個丑角」。阿澤維多的結論是：方言標準化譯法會扭曲人物形象，竄改原文風格，刪去文化涵義，因此應儘量避免採用。事實上，一些西方譯者意識到該譯法的不足，會在譯文相應位置添加「某人用某方言說道」之類的提示性詞語。桑切斯(Sánchez, 1999, p. 307)認為，「這些附加短語顯然能幫助讀者明白原作中用了方言」。

與以上學者不同，萊皮哈爾梅提出了辯證的觀點。她對一部當代芬蘭語小說英譯文的研究表明，把用方言寫成的人物對話譯成標準英語「會導致原作及作者的語言身份的丟失」，尤其是削弱方言「營造社會文化語境，賦予人物鮮明個性，增加幽默感」等功能，但「其結果未必只是負面的，因為比起語言身份，目標語讀者可能對譯文的其他方面（指小說的主題內容——引者注）更感興趣」（Leppihalme, 2000, pp. 247, 266）。萊皮哈爾梅(Leppihalme, 2000, p. 267)的結論是：「譯者只有在他們覺得值得做的情況下才會設法表現方言特徵，但那是要付出代價的」，「由於大多數英文讀者不注重原作的語言個性，其代價之一就是讀者數量的減少」。萊皮哈爾梅的辯證分析基於對文學方言的文學功能和譯文讀者接受的雙重考量，即方言標準化譯法會損害文學方言的文學功能，但從英文讀者接受的角度看卻是可以接受的。該個案研究表明，來自弱勢文化的文學作品想要進入強勢文化，並被目標讀者廣泛閱讀和接受，譯者往往被迫在翻譯策略上做出妥協，方言標準化譯法是對強勢目標文化的主流翻譯規範和讀者閱讀期待做出妥協的必然結果。

二、方言對譯法 (Dialect-for-Dialect Translation)

方言對譯法一般指選用某種目標語地域方言翻譯原文中的地域方言，其理論基礎出自英國學者卡特福德(J. C. Catford)。卡氏指出：「如果原文中某些片段（如小說對話）用一種不同於無標記方言(unmarked dialect)的方言寫成，譯者也許不得不選擇一種對等的目標語方言」；一個重要的選擇標準不是純地理位置上的對應，而是「人文地理或社會地

理上的對應」，例如，把用英格蘭東南部的倫敦東區方言 (Cockney) 寫成的人物對話譯成法文，「大多數譯者會選擇巴黎俚語 (Parigot) 作為對等的目標語方言，儘管這是一種法國北部的方言」。卡特福德承認，「這種翻譯對等是建立在語言變體（即倫敦東區方言與巴黎俚語）之間的：因為前者的方言標記主要體現在語音上，後者則主要體現在辭彙上，兩者的語音或辭彙特徵並不存在對應」(Catford, 1965, pp. 87-88)。依據卡氏的理論，一些西方翻譯學者認為特定情形下對等方言是存在的。維克與維克 (Wekker & Wekker, 1991) 指出，愛麗絲·沃克 (A. Walker) 的著名小說《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 中的美國黑人英語可以譯成非洲裔蘇里南人說的荷蘭語 (Surinamese Dutch)，因為兩者「在語言和社會文化涵義上是充分對等的」。桑切斯 (Sánchez, 1999, p. 308; 2009, pp. 206-210) 認為，用西班牙安達盧西亞方言 (Andalusian) 翻譯蕭伯納名劇《賣花女》中 Eliza 說的倫敦東區方言「相當有效」，因為該方言與倫敦東區方言的「社會、文化涵義相近」。不過，桑切斯 (Sánchez, 1999, p. 308) 也承認：「不管譯者處理得有多巧妙，這種譯法仍有其負面性，其中之一是譯文缺少自然的背景氛圍」。

與國內情況相似（參見王豔紅，2009a；朱達秋，2001；劉全福，1998；韓子滿，2002），很多西方學者質疑方言對譯法的理論基礎及實際效果，因此這種譯法的反對者遠遠多於支持者。紐馬克 (Newmark, 1988, p. 195) 認為，除非譯者精通威爾士方言，否則不必把法國作家左拉 (É. Zola) 筆下礦工說的方言替換成威爾士礦工說的土語，那樣做很不恰當；「鑒於當代英語方言日漸衰落，一篇譯成英語方言的譯文會顯得陳舊過時」。埃爾維等人 (Hervey et al, 1995, p. 113) 指出，方言對譯法「與所有的文化移植譯法一樣，冒著譯本顯得不協調的風險」；「把英格蘭東部諾福克郡土語掛在來自西班牙東部瓦倫西亞的鄉下人嘴上，會對整個譯本的真實性造成極壞的影響」。蘇格特 (Schogt, 1988, p. 116) 也認為，原文的地域方言特徵往往難以在目標語中匹配；蘇格蘭高地 (Scottish Highlands) 在很多方面與法國中央高原 (Massif Central) 對應，

但是用蘇格蘭高地土語對譯來自法國中央高原的農民所說的方言是「有風險的」，因為前者「在英文讀者心目中引起的聯想與原作的法國場景有衝突」。卡季什 (Kadish, 1994, p. 59) 發現，《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的一個法譯本試圖尊重原作中的美國黑人英語以及廢奴主義的弦外之音，但由於譯者把黑人英語譯成比原文更加「不合語法」、「程式化」的法語，「實際上卻強化了原文中隱含的種族歧視的弦外之音」。

在「操縱學派」旗手勒菲維爾看來，選擇目標語地域方言對譯原作方言反映了譯者的意識形態，如選擇不當會引起文化排斥，影響譯本在該地域方言區的接受。勒菲維爾 (Lefevre, 1992, pp. 48-49) 發現，古希臘喜劇作家阿裏斯托芬 (Aristophanes) 在劇作《利西翠姐》(*Lysistrata*) 中把斯巴達人搬上雅典舞臺，他們說的蹩腳希臘語「造成一種喜劇效果」，而琳賽 (J. Lindsay) 的英譯本 (1950 年初版) 用蘇格蘭方言對譯，薩瑟蘭 (D. Sutherland) (1961 年初版) 則用美國德克薩斯土語對譯。勒菲維爾指出：「兩位譯者都沒有考慮過思維定勢的『正確性』問題，也即認定一個亞群的文化比另一個優越的文化機制，也沒有想過把蘇格蘭方言或德克薩斯土語用在古雅典很可能產生年代混亂的後果 (anachronistic effect)」，因此，「琳賽譯本在蘇格蘭可能不會大受歡迎」，「薩瑟蘭譯本在美國南部可能不會產生太好的反響」。

瑪塔 (Määttä, 2004, pp. 321, 335-336) 認為，「語言的社會、種族和地域階層劃分各異，語言社團對書面化方言的容忍程度也有高低之分」，「因此原文準確的社會語言階層劃分是不可譯的」，也即方言對譯法難以準確再現方言的社會文化內涵。阿澤維多 (Azevedo, 2009, p. 194) 則指出，目標語中往往缺乏一種與原文方言對應的、能傳達其地域和社會文化內涵的非標準語言變體。因此，「學界對文學方言能否被成功譯成一種目標語方言頗有爭議」(Azevedo, 2000, p. 31)。

筆者注意到，對方言標準化譯法和方言對譯法的缺陷，以下三位學者的論述頗為精闢：克雷格 (Craig, 2006) 指出，它們都會引起「不可避免的翻譯流失」，「前者壓制敘事話語中的語言差異，對人物形象塑

造產生不利影響，後者導致內涵意義脫節 (connotative disjuncture)，有些讀者會覺得（故事場景）難以置信」；哈蒂姆與梅森 (Hatim & Mason, 1990, pp. 41, 45) 認為，標準化譯法會使原作者想要獲得的間離（或陌生化）效果 (alienating effect) 蕩然無存，方言對譯法則會產生「並非出於作者本意的效果」，即目標語方言在文本中會顯得「不自然」。

三、文學方言自創譯法

這是補償性翻譯策略之一，指譯者為處理作者運用的文學方言，「臨時創造一種不明確指涉目標語中某種語言變體的文學方言」 (Azevedo, 2009, p. 196)。阿澤維多 (Azevedo, 2009, p. 194) 認為，這種譯者自創的文學方言具有的目標語特徵「能夠傳達——即使只是大致上傳達——原作中有助於人物性格刻畫的那些（方言具有的）地域、社會或文化內涵」。事實上，我們可在圖裏提出的「文本素譯法」 (textemic translation) 中找到這種譯法的理論依據。圖裏建議譯者可用「文本素譯法」處理隱喻、方言等翻譯難題，也即「把與出發語文本中發現的文本關係對等的文本關係和能夠實現這些文本關係功能的目標語詞項臨時組合起來，將出發語文本素替換掉」 (Toury, 1995, p. 274)。就文學方言運作機制而言，圖裏所稱的「出發語文本素」是指原作中使用的文學方言，「出發語文本中發現的文本關係」是指標準語與方言之間的語言內部差異，因此譯者把這種語言內部差異與能夠表現這種差異的目標語詞項臨時組合，其結果就是創造了一種用來替換原作所用文學方言的特殊文學方言。圖裏 (Toury, 1995, p. 274) 指出，採用文本素譯法的譯文「會偏離目標語形式庫，從而可能影響譯本的可接受性」，因此認為該譯法「在翻譯實踐中是一種邊緣的翻譯策略，是規則之外的例外」。

阿澤維多 (Azevedo, 2009, p. 196) 的案例研究顯示：1755 年出版的一種英譯本用英國西南部方言的某些語言特徵翻譯比斯蓋紳士說的蹩腳西班牙語，這是包括亨利·菲爾丁 (H. Fielding) 在內的幾位 18 世紀英國小說家用來描寫鄉村人物的一種文學方言。換言之，該譯者採用了基於

某種現成文學方言的自創譯法。阿澤維多 (Azevedo, 2009, p. 196) 認為，「(譯文的) 這些地域特徵足以使人感受到一種土俗的口語，當代英文讀者也能看出來，從而聯想到敘事人提到此人說話『既算不得西班牙語，更算不得比斯蓋語』」。顯然，這種自創譯法對譯者的文學修養和方言敏感度要求極高，另一方面，選擇目標語作家用過的某種與原作相匹配的文學方言，也殊非易事。

阿澤維多 (Azevedo, 2009, p. 196) 還發現，為翻譯比斯蓋紳士說的拙劣西班牙語，《唐吉訶德》的一個早期英譯者莫托 (P. A. Motteux) (其譯本初版於 1701 年) 「沒有嘗試模仿某種英語方言，而是編造了一種與原文方言相匹配的蹩腳英語」。莫托在譯本腳註中解釋：「比斯蓋人通常都操一口蹩腳的西班牙語，因此英譯本做了相應的處理」(參見 Azevedo, 2009, p. 196)。有趣的是，1873 年出版的一種譯本吸收了莫托的方言自創譯文；1885 年出版的另一種譯本同樣採用了蹩腳英語，而該譯本的 1981 年再版本(經他人修訂)僅對原譯者編造的蹩腳英語「稍作修改」(參見 Azevedo, 2009, pp. 196-197)。也就是說，在阿澤維多考察的《唐吉訶德》的 12 種英譯本中，採用文學方言自創譯法的占到三分之一，說明這是西方譯者常用的一種翻譯策略，可見圖裏關於文本素譯法是「一種邊緣的翻譯策略」的論斷並不確切。筆者相信，一些有創作才華的國內翻譯家也用過這種譯法，但因目前相關研究缺失而尚未被發掘，著實令人遺憾。

上文提到，選擇目標語文學方言很不易，西班牙學者桑切斯·加爾維斯 (Sánchez Galvis, 2012) 提出的「方言重構模式」(model of dialect reconstruction) 似乎有助於解決這個難題。該學者指出，方言重構模式旨在修復方言這種語言變異標記在文學作品中的特殊意義，具體做法是：收集有語言變異標記的文學作品，創建一個語料庫，並進行標注；標注集可幫助我們析出語言變異標記機制，因此譯者可利用該語料庫鎖定方言標記，並將它們用於譯文中，譯本就能顯示語言變異，也即重構方言的意義和功能。然而，創建一個足夠大的語料庫不僅耗時費力費

錢，而且研究者必須熟練掌握軟體應用技術和數學統計手段，因此，這種做法個體譯者一般不會去嘗試，一般只有大型翻譯機構才有可能做到。

四、方言特徵淡化譯法

這是另一種常用的補償性翻譯策略。上文提到的阿澤維多 (Azevedo, 2009, pp. 197-198) 的研究顯示，四種英譯本採用「不正規程度較淺的英語形式」處理原作方言，且都是較近期的譯本（出版於 1949、1950、1995、2000 年），說明該譯法為當代西方譯者所常用。同時，這種折中的做法也為不少中外學者所贊成。¹¹ 鑒於在翻譯過程中不可能完全保留文學方言的語言特徵以及準確傳達其社會文化內涵，一些學者提出「方言功能保留論」作為方言特徵淡化譯法的理論基礎。例如，紐馬克 (Newmark, 1988, pp. 194-195) 認為，「在翻譯過程中，方言必然遭受某種程度的意義流失，但這並不意味著方言不適合翻譯」；譯者的任務首先是確定方言在原作中的功能，包括「指示語言的俚俗用法，強調社會地位差異，標明地方文化特色」，「然後把原作方言有節制地譯成能暗示方言特徵的自然俚俗、可能沒有階級差別的口語」。¹²

紐馬克的理論主張為不少西方學者和譯者所認同，但對於如何「淡化」方言特徵及「淡化」到什麼程度，各人的理解和界定各異。例如，英國漢學家詹納爾 (W. J. F. Jenner) 針對他翻譯老舍小說《我這一輩子》時遇到的北京方言指出：譯者在處理出發語文化特有的方言語彙時，不能把上海人換成紐約人或倫敦人，就像不能把老舍筆下的老巡警變成一個假冒的倫敦員警一樣。對於文學方言賦予作品的地方色彩，詹納爾建議用「淡化原色彩」的辦法處理，即用通俗、口語化的英語翻譯，而不是使用「鮮豔卻對不上號的色彩」（即用某種英語地域方言對譯），因

¹¹ 國內相關論述參見王豔紅 (2008)；卞之琳 (2002, 頁 132)；朱達秋 (2001)；陳勝利 (2013)；韓子滿 (2002)；Han (2004)。

¹² 需要指出的是，方言特徵淡化譯法基於方言功能保留論，因此這種淡化必須有個度，即譯文中有明顯的方言痕跡，否則就是標準化譯法了。

為「一張拍得好的黑白照比一張俗豔的彩照更能真實反映一個人的容貌」(Jenner, 1990, p. 194)。

埃爾維等人 (Hervey et al, 1995, p. 113) 認為，方言對譯法屬於「極端做法」，「最穩妥的方法可能是有節制地運用讀者能辨認出是方言的目標語特徵，同時這些特徵不會被讀者清晰無誤地看出屬於某種方言」。哈蒂姆與梅森 (Hatim & Mason, 1997, pp. 97-109) 則認為，譯者可用經過簡化的標準目標語再現方言的特定功能，而無須在目標語中尋找所謂的「最佳地域方言」。布羅多維奇 (Brodovich, 1997, p. 25) 指出，在俄羅斯，譯者通常用一種「通用的非標準俄語」翻譯原文中的文學方言；這種特殊俄語的「語言形式不符合公認的文學標準，但又不屬於某種地域方言」。英葛蘭德—迪米特洛娃 (Englund Dimitrova, 1997, pp. 50, 62-64) 考察了一部瑞典語小說的英、俄譯本，發現譯者「把小說人物說的方言譯成一種明顯的通俗口語」。她認為，譯者那樣做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英語、俄語的標準化程度較高，「譯者認為有責任遵循、維護目標語書面形式的規範」，二是譯者認為不同語言的地域方言之間不存在「內涵意義上的對等」，而且方言對譯法把故事從出發語文化移出，植入目標語文化，「違背了許多現代社會中有關嚴肅文學的翻譯規範」。

皮姆也主張方言特徵淡化譯法。他指出：「譯者要翻譯的不是語言變體本身，……而是語言內部的差異，橫組合關係上距離的改變，對語言規範的相對偏離。如能把這種偏離翻譯出來，那麼可以說語言變體標記已經譯好了」(Pym, 2000, p. 72)。皮姆認為，任何目標語方言標記詞，包括從出發語文化或其他文化譯借的詞 (calque)，都可用於翻譯這種語言偏離，但是譯者須注意「作者對方言的仿擬 (parody) 和真實性 (authenticity) 所作的調整，以及尊重兩者差異本身攜帶的相對價值」(Pym, 2000, p. 72)。根據皮姆的觀點，譯者無需選定一種對應的目標語方言，只需確定原文中仿擬之所在，例如《哈克貝利·芬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中吉姆說的美國黑人英語，然後在譯文相應位置或補償位置引入標誌仿擬的語言成分（如從美國黑人英語譯借的詞語）即

可。針對趨近真實性的語言變體，皮姆認為，「明智的譯者只需把目標語讀者感覺相對陌生的語言成分散置在譯本中，因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陌生未知的東西」(Pym, 2000, pp. 73-74)。

肆、結語

本文主要結論及筆者就此論題和未來研究路徑的若干思考如下：

- 一、文學方言之所以對譯者是一大挑戰，不只是因為語言變體轉換上的不對等，更是因為方言的社會文化意義很難移植到目標語言文化中。這決定了其相對不可譯性，而中西文化迥異的事實更加劇了這種不可譯性。面對這一難題，譯者都會尋求應對之策，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不可譯性不完全是負面的，它可能是各國語言文化在翻譯之後不被全部化約的保障。
- 二、方言標準化譯法最省事便利，但容易抹去「文化他者」之聲，因此理論上最不可取。方言對譯法看似合情合理，為不少譯者採用，但對於譯者應以何種標準選擇「對等」的目標語地域方言，目前學界尚無定論，且該譯法容易造成作品內容與形式的不協調，甚至引起讀者的文化排斥心理，從而影響譯本在目標地域方言區的接受。當下西方學界逐漸達成共識，認為作為折中的補償譯法，文學方言自創譯法和方言特徵淡化譯法比較可取、可行。前者大體上能夠傳達方言的地域及社會文化內涵意義，再現方言的文學文體功能，但可能影響譯本的可接受性；後者一定程度上可以保留、再現原作方言的文學文體功能，幾乎不影響譯本的可接受性。文學方言自創譯法對譯者的要求極高，而方言特徵淡化譯法的可操作性較高。
- 三、目前國內翻譯學界對方言標準化譯法和文學方言自創譯法關注不足，既表明國內文學方言翻譯實踐不足，更說明研究嚴重缺失。文學方言寫作是一種普遍現象，無論中譯外還是外譯中，都避不開文學方言翻譯這個難題。在當下提倡中國文學對外推介的大背景下，

如何處理中國文學作品（如擅長方言寫作的莫言、賈平凹、閻連科、韓少功、王禎和、黃春明等當代作家）中的文學方言，使譯本既能被海外讀者閱讀、接受，又能讓說方言的中國「文化他者」發聲，保留一點「中國鄉土的味道」，是擺在國內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四、正如陳吉榮（2010）所指出，方言翻譯研究在當今中西翻譯理論研究中都「處於邊緣化地位」，「需從根本上解決基礎理論建設問題」。如上所述，西方學者透過理論思考或個案研究，對文學方言的運作機制、可譯性及其翻譯策略的理論基礎、特點、效果等進行了切實有效的探索，比國內研究全面深入得多，但尚缺乏系統性，更缺乏實證研究。筆者認為，今後須開展的重要課題包括：

- （一）採用語料庫手段，找出譯者實際使用的所有文學方言翻譯策略（包括常規與非常規，主流與非主流），對譯者處理文學方言的風格進行個案研究，以及量化分析各種翻譯策略的特點和效果。
- （二）採用問卷調查、訪談等方法，瞭解目標讀者對文學方言翻譯現狀的回饋以及對翻譯策略的期待、偏好等。
- （三）採用描述性翻譯研究法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析出影響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和主觀因素。
- （四）採用翻譯過程研究法，包括有聲思維法 (TAPS--Think-aloud Protocols)、按鍵記錄法 (keyboard logging)、眼球追蹤法 (eyeball tracking) 等，考察譯者翻譯文學方言的全過程。
- （五）採用翻譯社會學研究法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比較分析權力關係、資本結構不對稱（從弱勢文學場域翻譯到強勢文學場域還是相反）以及語言地位差異（從中心語言翻譯到邊緣語言還是相反）對譯者選擇文學方言翻譯策略的影響。

五、在筆者所見的文學方言翻譯研究中，貝爾特勒 (Berthele, 2000) 對《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中吉姆說的黑人英語的案例分析可謂獨樹一幟：其目的不是評價哪一種翻譯策略可取、可行，而是透過考察目標社

會文化對美國黑人英語態度的歷史變遷，描述、解釋翻譯策略的歷時變化及其動因。貝爾特勒對 1890 – 1997 年間出版的 13 種德譯本的語言特徵分析表明，1960 年代前出版的譯本大多把吉姆的口語譯成一種「語法被簡化的洋涇浜德語 (pidgin)」(即文學方言自創譯法)，「貶低了吉姆的語言、認知能力」，晚出譯本則將其譯成「不再背負社會語言汙名的通俗德語口語」(即方言特徵淡化譯法)。貝爾特勒透過譯者序或譯後記對黑人英語的評價文字發現：1960 年代前吉姆被描述為「愚蠢的小黑鬼」，到了 70 年代，德國讀者被告知這本小說「控訴了奴隸制和對美國黑人的蔑視」；對原作的這種「反種族歧視性質的解讀」使得譯者「讓吉姆說一種接近標準德語的語言」(Berthele, 2000, pp. 588, 605)。該研究表明：目標社會文化對原作文學方言(尤其社會方言)態度的改變，會影響譯者的翻譯策略選擇，也反映了目標文化翻譯規範的變遷。貝爾特勒採用的正是描述性翻譯研究法，值得我們仿效。該項研究也說明，文學方言並無絕對正確或適當的譯法，強力主張特定譯法只不過是反映了社會在歷史進程中不同的價值觀，而此價值觀之形成又反映了翻譯政治下的權力關係。

最後須指出的是，當下不少西方翻譯學者熱衷於研究視聽翻譯(Audio-Visual Translation)中方言成分的處理問題(參見 Ranzato, 2010; Rosa, 2012; Zabalbeascoa, 2011)，而傳播媒介、翻譯方式和受眾的改變，要求視聽譯者採用有別於文學作品的翻譯策略。這自然不在本文範圍內，而是另一篇論文探討的話題。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卞之琳（2002）。*卞之琳文集（下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王豔紅（2008）。淺談黑人英語的漢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4，53-56。
- 王豔紅（2009a）。淺談文學翻譯中黑人英語之美學再現。*外語與外語教學*，11，53-56。
- 王豔紅（2009b）。《英語方言漢譯初探》簡評。*外語與翻譯*，1，77-80。
- 王豔紅（2012）。*美國黑人英語漢譯研究：倫理與換喻視角*。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 朱達秋（2001）。語言的社會變體與翻譯。*外語學刊*，4，85-88。
- 李穎玉、郭繼榮、袁笠菱（2008）。試論方言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中國翻譯*，3，64-67。
- 汪寶榮（2013）。魯迅小說英譯面面觀：藍詩玲訪談錄。*編譯論叢*，6（1），147-167。
- 夏志清（1996）。序一。載於夏志清、孔海立（主編），*大時代：端木蕻良四〇年代作品選*（頁12-24）。臺北：立緒文化事業。
- 張南峰（2004）。*中西譯學批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郭著章（1994）。語域與翻譯。載於楊自儉、劉學雲（主編），*翻譯新論*（頁739-750）。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陳吉榮（2010）。攝入性改寫視域下的翻譯理論研究。*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67-70。
- 陳國華（2007）。語言學對翻譯有什麼作用。載於 Peter Fawcett（原文作者），*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pp. vii-xxviii)。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陳勝利 (2013)。不似之似——論翻譯中的方言借用。《*前沿*》，16，127-129。
- 陳福康 (2000)。《*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傅雷 (1984)。致林以亮論翻譯書。載於《*翻譯通訊*》編輯部 (編)，*翻譯研究論文集 (1949-1983)* (頁 82-86)。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黃忠廉 (2012)。方言翻譯轉換機制。《*北京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145-147。
- 楊絳 (譯) (2011)。《*唐吉訶德 (上)*》(原作者：Miguel de Cervantes)。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605)
- 劉全福 (1998)。文學翻譯中的方言問題思辨。《*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3，1-4。
- 韓子滿 (2002)。試論方言對譯的局限性。《*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4，86-90。

英文文獻

- Anderman, G. (2007).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 P. Kuhiwczak & K. Littau (Eds.),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pp. 45-62). Clevedon, Buffalo &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 Azevedo, M. M. (2000). Shadows of a literary dialect: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n five romance languages. *The Hemingway Review*, 20(1), 30-48.
- Azevedo, M. M. (2009). Get thee away, knight, be gone, cavalier: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Biscayan squire episode in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 *Hispania*, 92(2), 193-200.
- Berthele, R. (2000). Translating African-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into German: The problem of 'Jim' in Mark Twain's *Huckleberry Fin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4), 588-613.
- Brodovich, O. (1992). The translator's strategies for non-standard speech:

-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In B. Lewandowska-Tomaszczyk & M. Thelen (Eds.), *Translation and meaning – Part 2* (pp. 355-358). Maastricht: Rijkshogeschool Maastricht, Facult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 Brodovich, O. (1997). Translation theory and non-standard speech in fiction.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5(1), 25-31.
- Catford, J. 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aig, I. (2006). Translation in the shadow of the giants: Anglophone Caribbean vernacular in a translated literary text. *The Translator*, 12(1), 65-84.
- Crystal, P. (1995).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glund Dimitrova, B. (1997). Translation of dialect in fictional prose - Vilhelm Moberg in Russian and English as a case in point. In Anonymous Authors (Eds.), *Norm,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language* (pp. 49-65). Stockholm, Sweden: Almqvist & Wiksell.
- Han, Z. (2004). *Dialect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Hatim, B., & Mason, I.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Hatim, B., & Mason, I. (1997).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ervey, S., Higgins, I., & Haywood, L. M. (1995). *Thinking Spanish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ouse, J. (1973). Of the limits of translatability. *Babel*, 19(4), 166-167.
- Ives, S. (1971). A theory of literary dialect. In J. Williamson & V. M. Burke (Eds.), *A various language: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dialects* (pp. 145-177).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Jenner, W. J. F. (1990). Insuperable barriers? Some thoughts on the reception of

- Chinese writing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H. Goldblatt (Ed.), *Worlds apart: 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 (pp. 177-197). Armonk, N.Y.: M. E. Sharpe.
- Kadish, D. Y. (1994). Translation in context. In D. Y. Kadish & F. Massardier-Kenney (Eds.), *Translating slavery: Gender and race in French women's writing, 1783-1823* (pp. 26-61).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Krapp, G. P. (1971). The psychology of dialect writing. In J. Williamson & V. M. Burke (Eds.), *A various language: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dialects* (pp. 22-2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Lane-Mercier, G. (1997). 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 The translator's aesthet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Target*, 9(1), 43-68.
-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Leppihalme, R. (2000). The two faces of standardization: On the translation of regionalisms in literary dialogue. *The Translator*, 6(2), 247-269.
- Lörscher, W. (1991).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übingen: Gunter Narr.
- Määttä, S. K. (2004). Dialect and point of view: The ideology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in French. *Target*, 16(2), 319-339.
- Mukařovský, J. (1970). 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 In D. C. Freeman (Ed.),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 (pp. 40-56).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Prentice-Hall.
- Pym, A. (2000). Translating linguistic variation: Parody and the creation of authenticity. In M. A. Vega & R. Martín-Gaitero (Eds.), *Traducción, metrópoli y diáspora* (pp. 69-74). Madrid: Editorial Complutense.
- Pym, A. (2008). On Toury's laws of how translators translate. In A. Pym, M. Shlesinger & D. Simeoni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pp. 311-

- 328).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Pym, A. (2015). Translating as risk management. *Journal of Pragmatics*, 85, 67-80.
- Rabassa, G. (1974-75). If this be treason: Translation and its possibilities. *The American Scholar*, 44(1), 29-39.
- Ramos Pinto, S. (2009). How important is the way you say it? A discussion on the translation of linguistic varieties. *Target*, 21(2), 289-307.
- Ramos Pinto, S. (2012). Socio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 Y. Gambier & L. van Doorslaer (Eds.),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 3* (pp. 156-162).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Ranzato, I. (2010). Localizing Cockney: Translating dialect into Italian. In J. Díaz Cintas, A. Matamala & J. Neves (Eds.), *New insights into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media accessibility: Media for all 2* (pp. 109-122).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 Rosa, A. A. (2012). Translating place: Linguistic variation in translation. *Word and Text*, 2(2), 75-97.
- Sánchez, M. T. (1999). Translation as a(n) (im)possible task: Dialect in literature. *Babel*, 45(4), 301-310.
- Sánchez, M. T. (2009). *The problem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xford & Bern: Peter Lang.
- Sánchez Galvis, J. (2012).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Towards a “model of dialectical reconstruction”. *RAEL: Revista Electronica de Linguica Aplicada*, 11, 125-136.
- Schogt, H. G. (1988). *Linguistics, literary analysis,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Shklovskij, V. (1998). Art as technique.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pp. 15-21). Malden: Blackwell.
- Stalling, J. (2014). The voice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ion Review*, 88, 1-12.

-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Wang, B. (2014). An interview with Julia Lovell: Translating Lu Xun's complete fiction. *Translation Review*, 89, 1-14.
- Wekker, G., & Wekker, H. (1991). Coming in from the cold: Linguistic and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the translation of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literary texts into Surinamese Dutch. *Babel*, 37(4), 221-239.
- Wu, Y.-P. & Chang, Y.-C. (2008, January 15).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Black dialect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 reconsidered: The case of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Translation Journal*, 12(1). Retrieved from <http://www.translationjournal.net/journal/43colorpurple.htm>
- Wu, Y.-P. (2009). Literary dialect in translation and proposal of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A pragmatic-based approach. *Spectrum: Studie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4, 77-88.
- Zabalbeascoa, P. (2011). Language variation in source texts and their translations: The case of L3 in film translation. *Target*, 23(1), 113-130.